

第2集

上集

天津文博论丛

TIAN JIN WEN BO LUN CONG

本集收录的是——有关历史文化研究、民俗文化研究、考古与文化遗产保护及相关课题研究、自然遗产保护与研究等方面的文稿。

李家璘 主编

天津文博院 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天津文博论丛

TIAN JIN WEN BO LUN CONG

李家璘 主编

天津文博院 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第2集

上集



图书在版编目（C I P）数据

天津文博论丛. 第2集 / 李家璘主编.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0. 6

ISBN 978-7-201-06546-5

I. ①天… II. ①李… III. ①文物工作—天津市—文集②博物馆—工作—天津市—文集 IV.

①G269. 272. 1-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111465号

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出版人：刘晓津

(天津市西康路 35 号 邮政编码：300051)

邮购部电话：(022)23332469

网址：<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tjrmcbs@126.com

天津午阳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

2010 年 6 月第 1 版 2010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787 × 1092 毫米 16 开本 43.5 印张 4 插页

字数：1100 千字

定价：130.00 元（上、下集）

《天津文博论丛》

(第2集)

主 编 李家璘

执行主编 田毓芬 姚 旻 韩瑞丽

编 辑 刘佐亮 王惠娟 尹学梅

苏芃芃 贺培姗

编 务 杨秉强

序

陈 克

科学研究是文博工作中重要的一环。仅就博物馆来说，许多教科书都讲到，科学研究是博物馆一切工作的基础。确实，从文物和标本的征集、研究、管理、保护，陈列展览的大纲编写、形式设计，到宣传推广与社会工作，甚至博物馆的建筑与设施等等涉及许多学科，其中有些属于技术和操作层面的学科，是现代博物馆不可或缺的。可以说博物馆工作处处是学问，但是博物馆科学研究的核心应当是涉及文物和标本的学科研究，也就是涉及博物馆最初产生和后来存在发展原因的学科。博物馆是因为科学研究和科学普及而出现和存在的，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

由于中国文化传统中的某些偏向，在中国古代并没有产生近代的数理试验科学，这导致了近代中国的落后和被动挨打，造成我们今天世界现状的科技文明产生于近代的欧洲，现代博物馆就是伴随着欧洲科技发展而产生的。从16世纪葡萄牙航海家麦哲伦环绕世界航行开始，到18世纪科克等人对世界各大陆沿海和欧洲博物学家对内陆的考察，打开了眼界，发现了地球的多样性。从而发展出了地理学、地质学、动植物分类学、考古学、古生物学、人类学、民俗学等学科，达尔文的进化论就是在这种基础上出现的。当年博物学家们收集的大量的世界各地的标本就成了后来博物馆的藏品基础。19世纪以后，欧洲学术界逐渐产生了学科分立的趋势，自然史、医学、化学、解剖学、生物学、植物学、数学和物理学超越博物学，有了属于自己的研究方法，而且，不同的研究方法交互影响，相互推进，它们逐步独立于神学之外，形成了“人的知识”。作为保存和交流公共知识的场所，图书馆、档案馆和博

物馆分别独立发展，成为欧洲科学研究体制的组成部分。

近代中国人在与西方文化的碰撞中认识到了学习西方科学文化的重要性，一些有识之士大声疾呼，开启民智。在这种背景下，博览会和博物馆成了普及现代知识的很好的形式，早期的博物馆也确实比较重视民众的普及教育。从这个意义上说，博物馆在中国的引进具有很强的实用目的。在近代中国，博物馆的科学研究功能并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新中国成立后，博物馆比较多地致力于宣传历史唯物主义和进行革命传统教育，同时也难免不断受到历次政治运动的冲击。拨乱反正以后，中国的博物馆事业得到了新生，但博物馆在蓬勃发展的同时，也遇到了商品社会冲击的困惑。有时博物馆仅仅发挥政治教育的作用，有时博物馆又仅仅被看成是旅游点，而博物馆建筑往往是为了改善市容环境才被提上日程。党的十七大以来，中央在号召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同时，指出博物馆是公益性事业单位，并决定国有博物馆逐步对社会免费开放，新形势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博物馆的定位。博物馆除了实用的功能外，应当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标志，应当是一个超凡脱俗的高雅文化场所，应当是在当前的浮躁社会中为民众提供思考的场所。

推而广之，我想到整个文博工作现在遇上的是最好的发展时机，但是高水平的文博工作还应当有较高的研究实力，这体现在要有高水平的学术研究和丰硕的研究成果，这个目标不是一蹴而就的，也是天津文博界领导和专家共同关注的问题。天津博物院编辑出版系列文集，蒐集整理全市文博系统专业技术人员改革开放以来的研究成果（包括新作未刊稿），其中有些文章很难说水平很高。我总的感觉这应该是借此倡导和鼓励文博专业人员钻研学术，形成风气，寄希望于来者的一项举措。其用心之良苦，可嘉可敬。

是为序。

前 言

李 家 璘

说来也是，我们的工作总是离不开“传承”二字。刚刚编就《天津国家级文物鉴定专家口述丛书》（一至四册），提交出版，转而又集中精力编辑反映天津市文博系统研究成果的文集——《天津文博论丛》（一至三集共四册）。

回想编辑此文集的缘起，是在与部分老专家谈有关人才培养、学术研究、科研成果这一话题的过程中萌生的。在承办天津市文博系统第一期“名师教室”的工作中，许多本系统专家（包括南开大学相关学科的教授）被聘为导师，他们分别与学员签订了师承关系，在传承博物馆学及相关技术、文物艺术品鉴定、历史学、考古学、自然科学、民俗与民间工艺、戏曲理论等方面，花费了大量的精力和心血，其实尚有许多因种种因素未被聘为导师的专家，他们都很关心天津的文博事业，关心年轻一代文博人才的成长，以及学术、学识、学风之传承，并以不同的方式向我们提出了许多好的建议，使我们深受鼓舞。这恰与天津市文化广播影视局（文物局）领导对我们的要求相吻合。我们以为，“传承”的形式是多样的。编辑出版此文集之动意，也是基于此而确定的。

目前，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尽快提升文化软实力的大环境下，文博事业同样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这已成为文博界同仁的共识。与此相联系，近几年天津文博系统各单位相继充实了一批具有较高学历的新人，一代学术新锐正在崛起。但是，文博研究工作传承性很强，对于前人的研究成果做深入的了解，拓宽视野，在宏观上掌握某一研究领域的研究现状，无疑对站在

更高的起点上，以新的视角，取得新的研究进展，是大有裨益的。此其一。

其二，2009年又适逢新中国成立60周年，作为一项集中反映改革开放以来，天津文博专业人员研究成果的献礼项目，也是为社会各界进一步了解天津的文博工作搭建一个平台。

本文集的编辑，自天津市文物局发出征文通知以来，作为承办单位，天津博物院陆续收到稿件近三百篇，其中不乏新老专家的力作。需要说明的是，许多专家的大作未及录入，不能综合反映成果全貌。另一方面，也有部分稿件稍欠功底和功力，文字表述也嫌浅显，可以看出天津文博界的整体科研水平亟待提高。

诚然，文博工作有其自身的特殊性。但是在不可避免的繁忙业务工作中，传承老专家的治学风范，夯实基础，刻苦治学，功到自然成，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心愿吧。

本文集的编辑采取征文的形式。凡在各级各类文博专业期刊、正式出版物公开发表的文章，以及参加省（市）级以上学术讨论会的入选论文，均在文末标出（原载……）；未标者为在初审的基础上录用的新作未刊稿。“注释”与“参考文献”的处理，采取凡文内标有序号的注释，文尾以[1]……标注；文内未标有序号的参考文献，文尾以1……标注。特此说明。

目 录

序.....	陈 克
前言.....	李家璘

(上)

历史文化与研究

16—19 世纪马铃薯在中国的传播.....	翟乾祥 (2)
徐光启在津南的农事活动.....	翟乾祥 (8)
清初开海禁与天津城市的发展.....	翟乾祥 (18)
天津民俗概说.....	顾道馨 (24)
乾嘉以来的津门风尚.....	顾道馨 (37)
试从传统社会心态剖析天津区域文化.....	顾道馨 (47)
《水经注》和天津地理.....	韩嘉谷 (51)
论山戎“病燕”.....	韩嘉谷 (67)
独乐寺源流考.....	韩嘉谷 (78)
关于夏文化探索的对话.....	李经汉 (94)
周叔弢和他收藏的敦煌遗书.....	云希正 (100)
评宋人陆秉对《周易》“大衍之数”的解说.....	郭鸿林 (106)
马嘎尔尼使团与天津.....	郭鸿林 (110)
论太平军在天津的几个问题.....	林开明 (113)
略论天津“都统衙门”的军事殖民统治.....	陈瑞芳 (124)
戊戌变法运动与天津.....	陈瑞芳 (134)
天津爱国布商标综览.....	蒋原寰 (146)
《二十一条》文本之辨析	
——兼评王芸生和李毓澍著作中对此问题的意见.....	张黎辉 (168)
静寄山庄盛衰述略.....	李家璘 (182)
试论清末天津警察制度的创办及其对城市管理的作用.....	涂小元 (187)
天津近代民间消防组织——水会.....	赵耀双 (198)
天津城市的发展与妈祖文化的关系刍议.....	赵耀双 (207)

浅议《皇会论》与串铃数子《子弟过会》	赵耀双 (212)
感受妈祖文化	郭 洧 (222)
“公”“善”“慎”——周馥主要社会心理剖析	刘佐亮 (226)
李鸿章与津榆铁路	
——兼评李鸿章在中国早期铁路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	王会娟 (235)
第二次大沽口战役胜利原因探析	侯晓慧 (251)
民族工业的缩影 运河文化的结晶	
——三条石地区“两业”形成发展的成因略考	柳 丽 (256)
天津商会当业碑记略考	李鑫桥 (259)
天津基督教女青年会活动探析——从两期季刊谈起	尹学梅 (265)
晚清天津商会纠纷调处权能述论	姚 旻 (273)
1912—1928 年的天津栈房业	苏芃芃 (285)
刘后同与北平和平解放	张彩欣 (295)
未战而胜负见矣——从《孙子兵法》看陈长捷兵败	曹 静 (302)
浅谈“兵者，诡道也”军事谋略思想在平津战役中的应用	时 昆 (308)
平津战役为何“缓攻塘沽，改打天津”	时 昆 (314)
平津战役中天津攻坚战总攻发起时间考证	刘立坡 (317)
孙子兵法在平津战役中的运用	李 健 (323)
平津战役之心理战	李世钊 (329)
天津文庙祭孔乐舞刍议	陈 彤 (337)
文庙祭孔乐与周代文武二舞	陈 彤 (345)
儒家思想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姜 琦 (348)
北洋临时执政府津门出台记	刘 萍 (350)
德艺双馨 丰碑永存——著名河北梆子表演艺术家银达子	高 峰 (354)
一时无两之名丑——京剧名丑刘赶三	高 峰 (358)

(下)

文化遗产研究与保护

天津地区现存碑刻资料综述	李经汉 (363)
蓟运河上游地区史前文化遗存初探	文启明 (373)
南杨庄遗址及其相关问题	文启明 (380)
安新庄遗址再认识	文启明 (390)
近代中国的见证——天津的不可移动物质文化遗产及其保护与问题	岳 宏 (398)

周秦汉时期环渤海地区红陶釜研究·····	梅鹏云 (406)
独乐寺塔壺门雕砖乐考·····	梅鹏云 (416)
福山塔维修工程报告·····	程绍卿 (429)
彩练明珠耀津城	
——关于海河两岸文物建筑基本情况及开发构想·····	程绍卿 郭 洧 (434)
末代皇帝和北洋总统在津几处寓所·····	刘 萍 (443)
燕山南麓夏商时期考古遗存研究·····	盛立双 (448)
天津地区战国秦汉时期的瓮棺葬·····	姜佰国 (473)
天津地区汉代墓葬形制分析·····	姜佰国 (483)
浅谈蓟县清代皇家建筑遗产的几个问题·····	甘才超 (490)
天津大沽炮台海字炮台和威字炮台“三合土”研究·····	李乃胜 张治国 王德发 (493)
工业遗产的认定及价值构成·····	刘 翔 (501)
从传统建筑的继承吸纳与发展看天津广东会馆·····	安宝聚 (506)
国之瑰宝 千年大修·····	黄立志 (511)
福裕禅师与盘山少林寺·····	黄立志 (516)
天津市宝坻区哈喇庄遗址的发掘·····	天津市文化遗产保护中心 宝坻区文化馆 (518)
天津出土历代墓志概述·····	杨 新 (532)
浅谈静海三古·····	孙德民 (540)
北塘民居·····	王 利 (543)
漫谈天津清真大寺·····	钱建国 (548)

自然科学

渤海鱼类复殖吸虫群落结构·····	李庆奎 邱兆祉 (551)
天津大黄堡湿地自然保护区水鸟生态研究·····	王凤琴等 (559)
天津地区湿地水鸟组成及多样性分析·····	王凤琴 (568)
天津沿海水鸟群落格局分析·····	王凤琴 (573)
中国物种评估以及濒危状况分析·····	郝淑莲 解 焱 (579)
羽蛾科昆虫的寄主与天敌(昆虫纲:鳞翅目)·····	郝淑莲 李后魂 (589)
中国羽蛾科新记录种记述(鳞翅目:羽蛾科)·····	郝淑莲 (606)
天津八仙山自然保护区维管植物区系研究·····	李 勇 (611)
西沙群岛鱼类群落特征·····	郭 旗 (619)
天津八仙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鱼类资源现状及保护对策·····	郭 旗 (629)
中新天津生态城生物资源调查·····	郭 旗 王全来 (633)
天津八仙山自然保护区孢春季的卧息地利用·····	覃雪波 (638)

中国北方七省市地区小食心虫族研究.....吕锦梅 郝淑莲 (646)

天津地区刺蛾科昆虫多样性研究及区系分析.....

.....吕锦梅 暨赵铁建 孙国明 郝淑莲 杨春旺 (649)

天津蓟县八仙山自然保护区新小卷蛾亚科资源初步调查.....吕锦梅 (656)

海洋生物技术在渔业生态环境保护中的应用.....杨春旺等 (664)

天津八仙山自然保护区蝶类资源调查研究.....杨春旺等 (669)

中国古脊椎动物学的奠基人——德日进.....李好瑾 (675)

后 记..... (679)

历史文化与研究

16—19 世纪马铃薯在中国的传播

天津博物馆研究馆员 翟乾祥

马铃薯最早引种至中土的时间、地点，半个世纪来始终是农学界关注的问题。农史学家万国鼎认为康熙《松溪县志·食货》中的“马铃薯”是马铃薯最早传入东南沿海的证明^[1]。目前有关论著多遵循这一说法。1990 年版《中国大百科全书·农业》对马铃薯的解说，也基本上未脱离前人窠臼。其实，《松溪县志》中的“马铃薯”是盛产于亚热带的黄独的别名^[2]。华裔美籍历史学家何炳棣通过对地方志的研究，得出结论：马铃薯传入我国的时间不早于 17 世纪末^[3]。北京农业大学王毓瑚教授说：“好像进入 19 世纪末才由英、法从印、缅引入。”^[4]近年来更不断有人参与马铃薯最早引进时间、地点辨析，涉及的单位有山西高寒作物研究所、西北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天津市历史博物馆和四川大学等，《中国农史》和《西北农大学报》提供了讨论园地^[5-10]。但是上述论著大多没有想到明清京畿会成为供应薯种的源头。

马铃薯原产南美洲，它的块茎作为食品出现在人类的历史上可以称为一件划时代的大事。恩格斯把马铃薯的出现和使用铁器并重，说：“下一步把我们引向野蛮时代的高级阶段……铁已在为人类服务，它是在历史上起过革命作用的各种原料中最后和最重要的一种。所谓最后的，是指马铃薯出现为止。”^[11]16 世纪，西班牙称雄海上，开辟墨西哥和吕宋乃至中国东南沿海的航线，来自南洋的贸易和朝贡方物，从东南沿海进运河后经天津至京师。在明代，朝贡方物是当时引进外来物品的主渠道，故我国马铃薯多滥觞京津。万历年间，晋陵（武进）蒋一葵任北京西城指挥使，他所编的《长安客话》卷二“皇都杂记”称：“土豆绝似吴中落花生及香芋，亦似芋，而此差松甘”，另引会稽（绍兴）徐文长（1521—1593 年）诗：“榛实软不及，菰根旨定雌，吴沙落花生，蜀国叶蹲鸱……”^[12]万历太监刘若愚（1541—1623 年）编有《酌中志》^[13]，明末吕毖从中摘录《明宫史》五卷，其中火集“饮食风尚”载：宫中“灯市十六日后斯时所尚珍味（大内进御口，非时物曰珍）……辽东之松子，蓟北之黄花金针，都中之山药、土豆，南都之苔菜，武当之莺嘴笋、黑精、黄精，北山之榛、栗、枣、桃……不可胜数也”^[14]。上述的百种“珍味”，仅有山药、土豆产自北京。明代有上林苑嘉蔬署的专业“菜户”供应皇家蔬菜，当时北京紫禁城附近的地从东华门至丽春门（南池子）凡里许，皆种瓜蔬，注水负瓮，宛如村舍。明代上林苑嘉蔬署的皇家菜户在不具备繁育条件下，以其娴熟的技艺筛选繁育出很多品种群。这项工作从 16 世纪末到 17 世纪中叶为时近百年，为华北提供了薯种源地。这件

事在农史上功不可没。徐光启晚年位极显赫，他一定看到过和吃到过土豆，但绝不可能从御菜园得到薯种，更不可能有种植的时间，所以仅能以土豆“味甘美”^[15]几个字来表达，而不可能似番薯般先移种沪上，又试植于津南咸水沽，并编出连篇累牍的文章。

清朝取消了明代皇帝供应系统，皇家菜户成为普通农民，土豆也登上了百姓的餐桌。但是外地的引种是迟后的。乾隆初人口骤增，迫切要求增加粮食的产量，再加上乾隆三十七年（1722年）又明确提出“永停编审”，户口的管理放松，农民有了迁徙的自由，这样才使土豆引种到晋、冀、鲁、豫和关外的广袤地区。

16世纪末，漳州海澄月港开放“洋市”（外贸），由于地近吕宋，是丝绸之路的始发港，故是时“漳、泉民贩吕宋者……人口数万计”^[16]，“行货转贩，外通各洋，市易诸夷……亦有我压冬之民教其耕艺，治其城舍”^[17]。明朝的贸易政策推动海交和走私。每年西班牙从美洲进口墨洋百万，成为中土的流通货币。漳、泉人趁季风往返，美洲到达吕宋的土特产从多渠道引至东南沿海，番薯、花生、烟草都能落户桑梓。马铃薯难在亚热带生存，仅能“昙花一现”，不可能纳入闽、浙古方志。1625年荷兰一度窃据台湾，与西班牙竟夺海上，或认为大陆的马铃薯来自台湾。明末清初大陆和台湾断航，仅清顺治十二年（1655年）荷兰东印度公司使团从爪哇海上经穗抵津达京，企图建立商贸关系，清廷以进贡方物对待；继于1663—1792年又五次来华，船上马铃薯常流入途经沿海城市。“爪哇薯”之名源于此。1840年后，各国传教士的足迹深入我国穷乡僻壤、高寒山区，常带来薯种，但绝不能成为主流。

马铃薯引至中土的另一渠道为通过印、缅移植滇省，称洋（阳）芋，较东南沿海和北京约迟一百年。滇、川、黔的洋（阳）芋后来传播到西北和西南的辽阔地区。

马铃薯引种各地后就很快融入本地的风土，因时因地而异，形成很多别名，常造成混淆，甚至在一个区域的推广过程中也能产生不少的俗称。康熙二十年（1682年）编成的《畿辅通志》“物产志”：“土芋，一名土豆，蒸食之味如番薯。”同时，京师的《宛平县志》（1685年）卷三“物产蔬类：地豆”。雍正《直隶深州志》（1732年）卷二“物产蔬类：地豆又名‘土生’”。乾隆二十年《丰润县志》“物产蔬类”：“土芋，俗呼土豆”。马铃薯在万历末不可能引种津沽，在《农政全书》卷二十七“树艺：附香芋（形如土豆，味甘美）；土芋一名土豆、一名黄独……”^[18]中的“香芋”，很可能即今称的土豆，因徐光启是上海人，南人惯称黄独为土豆，从而把京津地区称的土豆改称为香芋，所以乾隆四年《天津府志》卷五记“蔬类：芋又一种小者，名香芋，俗名土豆。”乾隆七年《威海卫志》卷四载“物产蔬类：近有种香芋者……”因引种自津门，也称马铃薯为香芋。可见，海河中下游甚至山东某些地方古地方志的蔬菜中的土芋、土豆、土生及香芋都是指马铃薯。薯蓣科山药（*Dioscorea Batatas*），叶腋生的珠芽称山药豆，马铃薯形味酷似山药豆，故清代北京平民多称土豆为山药豆。迨道光初马铃薯引种到晋北中，又有了很多新的名称。如道光十年《大同县志》卷八“风土物产，佐食者蔬白薯，其大如拳，俗名曰‘子山药’”；因系舶来品，祁雋藻在同时的农书《马首（寿阳）农言》（1836年）中还称洋山药；之

后还出现山药蛋之名。这些称呼显然从北京的山药豆衍生而来，从而可以看出山西马铃薯（山药蛋）是引种自京畿。晋东南还有地瓜、地蔓的别名与山药蛋并称不悖。陕、甘、青、宁引种自滇、川、黔、鄂、湘皆称为阳（洋、杨）芋。20世纪初，洋芋已融入当地的风土，如西北的谚语：“甘肃有三宝，洋芋、沙锅、大皮袄”。当然，名称的区域划分也不是绝对的。如道光陕西《石泉县志》卷一“地理志”载“‘爪哇薯’俗称洋芋，全境皆产，山内尤多”，在阳（洋）芋的方言区出现“爪哇薯”，反映出马铃薯的引种不仅是靠主渠道。又如河南邻鄂、陕等区域称阳芋，北部傍河多称土豆，还有地区称洋芋，正说明引种过程常是多源与反复的。在我国，从马铃薯的各种不同方言别称，如香（洋）芋、土豆（芋）、山药蛋（豆）、地蛋（豆）、爪哇薯、洋薯，等等，可以发现它在我国大地上传播的途径与名称趋同过程。土豆这个北京方言，经过三百年的积淀，才成为正名，并衍生出山药蛋这个视为大众通俗象征的名称，它们的蕴涵是深厚的。

当代英国农学家霍克斯（P.H.Hawkes）在其《马铃薯的改良科学基础》中说马铃薯约17世纪末由英国传教士传入印度，引至中国还稍早些^[19]。马铃薯于1553年首先至西班牙，1563—1565年引到英格兰、爱尔兰，很长阶段都作为牲畜的饲料和奇花异草观赏，法国大革命前夕，皇室用薯花作饰品而不敢食用。日本的土豆是荷兰人于1598年带至长崎港。从我们上文讨论内容可以确定，我国土豆的引种时间决不会迟于日本甚至欧洲的一些国家。马铃薯引入欧亚后，在我国首先作为食品，比英法等国进入餐桌早一百多年。明清时期，马铃薯不仅是皇家的珍味，家庭盛饌，甚至枝叶都能做成小菜。

马铃薯在明万历年传入中土，从东南沿海至北京。当时仅能成为皇室、显贵盛饌。清初虽进入百姓餐桌，也仅局限京畿城市。到乾隆间，人口成倍骤增，迫切垦荒增粮，外来高产作物承担了重要角色，尤其马铃薯特别适于高寒山区生长。马铃薯从乾隆三十年后开始引入西南、西北地区，尤其陕南高原（秦巴山地），四方来垦者百万，种植作物以洋芋、玉米为主。严如煜任汉中知县、知府二十余年，他的《三省边防备略·民食篇》虽为道光二年刊刻，但追叙了嘉庆间（1796—1820年）该地区农垦过程。如说：“洋芋花紫、叶圆，根下生芋，根长如线，累累结实数十、十数颗。色紫，如指、拳，如小杯，味甘而淡。山沟地一块，挖芋常数十石……洋芋切片堪以久贮，磨粉和荞麦均可作饼、馍”。旷土尽辟之下，马铃薯落户高寒，适得其所，并成种源区。在当时“广济民食”的农业政策指引下，马铃薯的欣欣向荣，在增产粮食上，确实发挥了难以估量的作用，当代一些学者称之为中国粮食生产史上的一次革命。随着马铃薯的传播，因地尽而山，亦造成了对占国土近半的山地、高原的掠夺性、开发。